



Wholly owned by UTAR Education Foundation

# 梁武帝慈悲思想探讨

**A Study of Merciful Thought of Emperor Liangwu**

**邱婉萱**

**KU WAN SYUEN**

**14ALB00906**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APRIL 2020**





Wholly owned by UTAR Education Foundation

# 梁武帝慈悲思想探讨

**A Study of Merciful Thought of Emperor Liangwu**

**邱婉萱**

**KU WAN SYUEN**

**14ALB00906**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APRIL 2020**

# 目次

宣誓 .....	ii
摘要 .....	iii
致谢 .....	v
第一章 绪论 .....	1
第一节 课题背景、研究动机与目的 .....	1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4
第三节 研究方法、范围 .....	5
第四节 论文架构 .....	6
第二章 梁武帝慈悲思想之起源 .....	8
第一节 儒家的影响 .....	9
第二节 佛教的影响 .....	11
第三节 小结 .....	14
第三章 梁武帝慈悲思想之体现 .....	15
第一节 〈断酒肉文〉的慈悲思想 .....	15
第二节 〈梁皇忏〉、水陆大斋的慈悲思想 .....	19
第三节 奉佛事迹反映的慈悲思想 .....	23
第四章 结语 .....	26
参考文献 .....	29

## 宣誓

谨此宣誓：此毕业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电子或口述资料，皆已注明具体出处，并详列相关参考书目。



---

姓名：邱婉萱 KU WAN SYUEN

学号：14ALB00906

日期：2020年3月29日

论文题目：梁武帝慈悲思想探讨

学生姓名：邱婉萱

指导老师：陈明彪博士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 摘要

梁武帝萧衍的奉佛事迹在史家中一直是一个特别的主题，古时史家虽大多以其崇佛作为梁朝亡国的理由，但后世学者就给出了不一样的答卷。梁武帝奉佛从文化角度而言，呈现出两种高度文化的相互碰撞后又相互融合的结果，也就是说儒家文化与佛教文的融合。因此，从文化视角来说梁武帝崇佛并不是只有坏处而无好处的，它是值得去探讨的。而在这件事情中，梁武帝所处的独特环境对他的思想形成起到一种促成作用。世奉道家却也接受着儒家大环境教育的梁武帝，在齐竟陵王萧子良的西邸与佛法、僧人以及佛经有所接触，从此对佛教一见倾心潜心研究。他对于佛法以及佛经的研究甚是透彻，不仅有着一套自成一体的佛学思维模式，更对佛经中没有明确解释的部分钻研出自己的意见，交出属于自己的答案来。他的思想中杂有儒家的功利思想色彩，但却是经他自己转化为利己模式的功利心。他对于佛教修行秉持着积累福德、功德就能够修行自身，进而证得涅槃果德的想法。因此他在推广佛教以及它的慈悲思想上十分积极，举办法事、请法师讲经、制忏等都是他为了弘扬佛教以及佛法而行的。于是，他推出〈断酒肉文〉下令要宗庙和僧人都戒掉吃肉和喝酒的习惯，以此展现他对于包括飞禽走兽在内的众生的关怀；制作〈梁皇忏〉帮助众生忏悔以及祈福，功德回向给六道一

切众生；建造佛寺佛像、举办法会，甚至是舍身入寺将自己奉献给寺庙等也是他为了弘扬佛法而作的决断。然而，他的这一系列奉佛行为虽是他慈悲思想作用之下得出的结果，私底下仍隐藏着为自己的修行做一种累积的私心。梁武帝的奉佛行为对于后世有着影响，在当时也对民生造成了相当重的负担，可以说是对他的王朝投下了一颗不定时炸弹。把梁武帝的崇佛说成是佞佛亡国的学者不少，然而梁朝亡国有其他更加关键的理由，他的奉佛行为究其根本也只能是其中一个影响因素罢了。因此，梁武帝奉佛并没有造成太严重不可收拾的后果，反而对于佛教的中国化有所推动，应该给予他一个更加持平的评价。

**【关键词】** 梁武帝 慈悲思想 断酒肉文 梁皇忏 崇佛

## 致谢

离毕业只差临门一脚，在拉曼大学、中文系时的种种却已十分模糊。在读时间相较他人长很多、很多，在这里结识的友人也非常非常多，创造出的回忆比起先前的十几年更是精彩许多。兴许是大脑粉饰了回忆，也许是一切都已不再重要，如今能以言语倾诉的仅仅这肤浅淡泊的字句。无论如何，遗忘总是好的，毕竟负重前行并不能走远，而要远走亦不需要枷锁与束缚。

自父亲去世以来，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以及母亲就肩负着养育照料我们姐弟仨人的重担。然而，入读大学的我却曾经有恃无恐地挥霍他们给我的一切。尽管我成绩不优秀、还旷课、休学，惹了各式各样的麻烦还自己独自钻牛角尖，他们都没有放弃我。姑姑阿姨婶婶、舅舅叔叔们也都一直相信着我能够毕业，以期待而温柔的目光注视着我的每一步。弟弟妹妹们虽然会埋怨我忙得没空回家、没空与他们打电话，但只要我回家，他们就会带着满满的笑容，陪着我游戏玩乐。我很感恩我的家人，感谢他们给我的爱和帮助，若是没有他们，就没有今日的我。

系上的老师和职员们也是我大学生活中的一大助力，论文指导老师会细心地关注我的论文方向，提供我线索与资料继续写下去；丽丽老师虽然嘴里说着很忙很忙，却也常常空出时间听我倾诉；爱梅老师、杜老师、余老师在我的论文上都提供过宝贵的意见；良娥老师也总是关心着我和同学的身心健康，让我觉得中文系就像一个大大的家；系办职员们虽然偶尔会对不負責任的我们生气，却依然会为我们提供最齐全、完善的帮助。我很高兴选择了中文系，也很幸福能够在拉曼大学中文系读到最后。在此，还请容我对关照着我的老师们说一声：谢谢你们！

最后，感谢在这最后两年陪在我身边的好友们，雪儿、婉羚、Sam、海螺、小郭、美伊、杀鸡、晓倩以及许许多多我没能提及的朋友，谢谢你们一路相伴。



## 第一章 绪论

梁武帝萧衍，字叔达，小名练儿，祖籍南兰陵中都里，生于宋孝武大明八年（464），卒于太清三年（549）。天监元年（502）称帝，在位时间长达四十八年。梁武帝作为南朝梁代皇帝，其在位期间的奉佛事迹一直是学术界探讨这位“皇帝菩萨”的着重点。对于梁武帝崇佛一事历代的评价可谓褒贬不一，近代有学者从佛教在中国发展的角度赞扬其所为，而当代则大多是从帝国兴衰之角度贬斥其“佞佛”亡国。究其根本，每个选择必然如双面刃，好坏各执一端，不可能全都是好的，亦不会只有不好的影响。梁武帝崇佛除了推进佛教中国化及产生了对后世佛教徒饮食习惯的影响之外，同时也使其沉浸在佛教自身的修行之中，甚至荒废了政治。

### 第一节 课题背景、研究动机与目的

提及梁武帝萧衍，就无法不谈其即位后三年即舍道事佛之事，其为佛教所做之推广几乎贯穿了其在位时间的全部。实际上，梁武帝一生经历过三教的洗礼，除去儒家教育之外，梁武帝更是老子的崇奉者。其佛缘应是缘自在齐竟陵王萧子良西邸时，与号称“八友”<sup>1</sup>的沈约、谢朓等人接触了僧人与奉佛的贵族。

从沿袭自家世的道教观念至儒家教育，再到由其自身所选的佛教，通晓三教义理的他自成一套思想观念。有学者尝从梁武帝的政治野心之角度谈其推崇佛教的事迹，言其为了转移权贵与其他人的注意力，将他们的关注引至佛教所宣传的彼岸与来世，以此来稳定他的政治地位。然而，从梁武帝所著之佛教著作及其行为来看，梁武帝的政治野心早就在其选择入佛门时便有所动摇。梁武帝早期或仍有些许借助佛教来达成其政治目的的野心，但是在长久接触佛教义理之后，便已

---

<sup>1</sup> 竟陵八友，南北朝时期受竟陵王的号召而聚集起来的八位文学之士，其中包括王融、沈约、谢朓等人。

逐渐失去这样的动机。梁武帝后期的作为，出自其从佛教与儒家混合而得的思想——以解脱为目的而贯彻佛教的慈悲思想。

梁武帝尝在其〈捨事李老道法诏〉<sup>2</sup>中言：“宁在正法之中长沦恶道，不乐依老子教，暂得升天。”（大正藏 52，p.0111c）这段话表明梁武帝认为佛教乃是能助人脱离轮回的“正法”，为出世的善法；而道教则是入世的善法，能让人得到精神上的暂时解脱。此亦说明梁武帝在推崇佛教的同时亦不排斥儒、道二教，反而三教并用的缘由。又说，“老子、周公、孔子等，虽是如来弟子，而化迹既邪，止是世间之善，不能革凡成圣”（大正藏 52，p.0111c），据此可说梁武帝是认定了三教皆是以教人向善为教理，儒道二教以入世的与人、与天地为善作重点，而佛教则是教人以解脱轮回的出世善法为主。故此，梁武帝将佛教视为能助其寻得“成圣”之法的“正法”。是故入佛教后大举推行佛教，造寺建像、舍身入寺等，都是梁武帝为求解脱故而累积自身福德所为。

慈悲一词具有拔苦与乐的意思，据《大般涅槃经》云：“为诸众生除无利益，是名大慈；欲与众生无量利乐，是名大悲”（大正藏 12，p.0696a）。意即慈悲即为众生求得安乐除去苦痛，而此亦为梁武帝之追求。梁武帝的慈悲思想建立于帮助自身修得正果的仁爱利人思想基础上，以自身修行为首要，再向救渡别人以建立自己的福德扩展。简而言之，即是修行佛法的同时亦将推广佛事与渡化众生当作自身修行的一环，为了累积功德而积极实践。

梁武帝慈悲思想的理论基础除了佛教的慈悲为怀思想外，也带着儒家思想、菩萨思想、般若学及涅槃学的影子。且不论梁武帝的思想本身就混杂着儒道玄佛等不同类型的，慈悲思想本就与菩萨脱不了干系。而梁武帝的佛学思想中更是混有大量的儒家思想，以致于他在阐述佛家经典时经常引用儒家经典加以解释。此

---

<sup>2</sup> 此处根据《大正新修大正藏》中的篇名，其他名称有〈舍事道法诏〉、〈舍道事佛文〉等。

外，几乎主导着梁武帝佛学思想的般若学及涅槃学推动了他慈悲观之下的行为模式，让他由自身受戒素食演变成推行戒断酒肉、积极呼吁百姓入寺出家受戒持斋。一系列举措被弘扬佛法的大前提包裹着，也涉及梁武帝各种不同的思绪与想法。

〈断酒肉文〉为梁武帝所发布的著作之一，内容从六个角度论述戒断酒肉的好处与必要性，其主要受众为僧人，目的是要以皇帝身份勒令僧人与宗庙不得杀生、禁食肉。不杀生与禁食肉这两点综合即体现了佛教的慈悲思想，亦与梁武帝所欲贯彻的慈悲思想一致。原文中梁武帝亦尝从食肉会产生“怨怼”的角度言食肉与孝道之间的联系，故此篇作为梁武帝所颁布的著作之一，应能充分体现梁武帝的慈悲思想与佛教观念。其次，就〈慈悲道场忏法〉之内容而言，此篇虽并非梁武帝一人之作，但是根据学者考察，此篇亦与梁武帝本人脱不了干系（徐立强，1998：181）。除了内容与梁武帝的佛教思想一致，此篇亦与其〈断酒肉文〉有着相似之处。〈慈悲道场忏法〉作为忏文，其内容重视素食与孝道，与梁武帝所行之道极为相像（陈佳政，2011：21）。是故本文以此忏法原文作为另一论据，讨论梁武帝所奉行的慈悲思想。

为了进一步论证梁武帝慈悲思想在除了〈断酒肉文〉与〈慈悲道场忏法〉二篇之外仍有所体现，本文亦提出了水陆大斋以及其所行其他佛事作为补充论述。梁武帝自身所受的菩萨戒与对己身的修行是其“自渡”的部分，而“渡人”的部分则是以推广佛事、〈断酒肉文〉、〈慈悲道场忏法〉、水陆大斋等为主，并且此渡人的部分也被梁武帝视为自身福德之一。

综上所述，本文尝试深入剖析梁武帝推广佛教之事迹的动机，并从中探寻梁武帝的慈悲思想之体现。由此，即可证明梁武帝并非仅将佛教当作政治手段，而是对其倾心方有这一系列的举动。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关于梁武帝之研究，不同时代从不同视角去探究的学者数不胜数。从研究梁武帝自身至剖析其著作，再到由其政治身份等深入探究等等，各个角度的各种研究作品在学术界已屡见不鲜。笔者尝试整理所收集到的研究资料，如专著、学位论文、期刊论文等，进行归纳并且分析内容，以厘清前人研究的脉络。以下，将根据资料类别进行前人文献之回顾。

第一类为与梁武帝相关之资料，其中包括收录梁武帝残存之佛学著作的《大正新修大正藏》<sup>3</sup>。关于梁武帝之生平史料，则是以唐姚思廉撰《梁书》与唐李延寿撰之《南史》为参考。此外，以任继愈著《中国佛教史》、汤用彤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方立天著《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以及颜尚文的《梁武帝》为补充参考。论文方面则从陈伟娜著〈梁武帝萧衍的佛学思想及宗教实行〉中理解梁武帝之佛学思想立论点为儒学，并对其佛教实践家之行动力有所认知。另，华方田所著〈关于梁武帝奉佛事迹的两个问题〉中所提及的舍身次数与佛教是否被定为当时的国教问题，亦为梁武帝生平之事迹做出了厘清。

第二类为与〈断酒肉文〉相关之资料，原文资料方面取《大正新修大正藏·广弘明集》中的〈断酒肉文〉。书籍方面，前述的任继愈《中国佛教史》及方立天的《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都对〈断酒肉文〉进行了论述，他们皆同意梁武帝是因注重僧团戒律，为了约束僧团而作此文。论文方面，夏德美著〈论梁武帝的《断酒肉文》与佛教中国化〉为〈断酒肉文〉之颁布时间提供了深入的分析，并就素食对于佛教与当代的意义提供了讯息。

---

<sup>3</sup> 取自 CBETA 电子佛典集成。

第三类为与〈慈悲道场忏法〉相关之资料，原文资料方面取自《大正新修大正藏》的〈慈悲道场忏法〉。期刊论文方面以徐立强著〈“梁皇忏”初探〉作为〈慈悲道场忏法〉的原文内容分析，得以了解梁武帝的思想并加深了对此忏文的理解。此外，亦参考了陈佳政著之〈忏法、慈悲与佛教中国化——以《梁皇忏》为中心〉学位论文，其内文深刻剖析了此忏法与梁武帝的思想之间的联系，亦提供了本文研究之视角。

第四类为与佛教相关之百科。在佛教知识方面，笔者以《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中的佛教篇为参考，从中获取佛事仪式中的忏法资料、水陆大斋之内容以及僧伽制度中素食制度之资料。

本文的题目为〈梁武帝的慈悲思想探讨〉，旨在从梁武帝之作为与著作中探究其慈悲思想，并从中论证其一心入佛教，所作之推广皆因其欲为自身累积功德、务求解脱，是故其自渡渡人行为模式得以成立。

### 第三节 研究方法、范围

由于梁武帝一生的奉佛事迹颇多，加上他所参与制作的佛经以及译经活动也不在少数，受制于篇幅，本文的框架将锁定于影响梁武帝慈悲思想的因素以及能够展现出梁武帝慈悲思想的两篇文献上。除此之外的事迹将只进行粗略的论述，作为论证梁武帝慈悲思想的次要佐证。

笔者运用了文献研究法，通过收集、鉴别、整理与研究课题相关的文献，进一步了解并且获取资料。笔者通过收集与整理梁武帝之著作、史书中之相关记载及梁武帝相关之记录与文献，并就以上资料对梁武帝的行为进行剖析，从梁武帝作为佛教徒之身份剖析其思想及动机。其次，笔者也透过多方考据的方式对所取

得的文献资料进行分析。除了对文献内容进行分析以外，笔者也就文献本身的功能性、目的、效果等进行分析与推论，务求对他的所为作综合且公正的分析。

除此之外，笔者也透过历史研究法将梁武帝的生平作一横向的分析，从中截取出梁武帝所处的时代背景与环境，并分析当时的思想种类与对其具有影响力的思想。梁武帝身为一个有所作为的历史人物，其思想不可能是凭空诞生毫无根据的。故此，对他所处的时代背景进行分析之后方能得知他受到的影响，并根据这些影响源推导出他的慈悲思想的完整面貌。因人的思想并非单元而是混杂着多种多样的想法的，综合分析他所受的影响才不出现偏颇一方的现象。

#### 第四节 论文架构

本文主要探讨梁武帝所行的佛事以及佛教修为，并从中探究其慈悲思想以及自渡渡人的行为模式。主体架构将分为三个部分，依次论述梁武帝的慈悲思想形成、行为表现以及造成的影响。

第一部分将论述梁武帝慈悲思想的形成以及儒、佛二家对他的影响。梁武帝出生在一个各家思想相互抗衡融合的时代，除了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以及当时盛行的佛教之外，家世背景也给了他接触老子道教的机会。梁武帝好学勤奋的态度使他对各家经典都有所钻研，自身的胸襟也让他对各家思想充满包容力，能够自在地调和不同思想之间的矛盾。这样的梁武帝其思想可以说是极其复杂，行为模式也偶有让人费解的时候。然而，综合其生平所经以及他自身所重视的种种思想来看，他的行为与思想看起来矛盾的部分似乎就能够得到解释。故此，本文的第一小节将会处理影响梁武帝思想的儒家思想因素，第二小节则是从佛教方面探究对梁武帝造成影响的思想因素。

第二部分将以梁武帝的〈断酒肉文〉以及〈慈悲道场忏法〉、水陆法会来剖析他的慈悲思想的体现。第一小节根据〈断酒肉文〉阐明其中所反映的慈悲观念，其中包括不杀与疏食两个部分。加之其颁布此诏前后的行为与所下之诏令，综合论述其慈悲思想以及自渡渡人的行为模式。第二小节则是以〈慈悲道场忏法〉及水陆法会之举办动机与功能阐述梁武帝的慈悲观念及反映，内容包括探讨其内容、功能性、梁武帝之目的与思想。第三小节则会根据梁武帝造寺建像、推广佛教等佛事内容谈其所具备之社会功能，作为补充并且论述梁武帝所为之目的。

第三部分为分析梁武帝慈悲思想的影响，内容涵盖当代及后世两个方面。梁武帝的言行举止虽然体现了他慈悲为怀、欲广度众生的思绪，但是他推行佛事的当儿对周遭也造成了伤害。他的慈悲思想关注点从妻妾群臣民众遍及禽兽，实际上所行对草根阶层的民众造成极大困扰。由此，可以总结出梁武帝所形成的慈悲思想以及行为模式，并且针对上述内容对他进行批判。

综上，本文即可从梁武帝奉佛的言行举止中，分析其行为动机以及慈悲思想，并总结出他所作所为的影响以及价值。以此，能够更持平地评价梁武帝的奉佛事迹。

## 第二章 梁武帝慈悲思想之起源

梁武帝的家世背景、时代背景与其一生中交错着多种不同的思想。他所处的大环境以儒家教育为主要背景，而家族世代则是世奉黄老道教，当时的佛教在士大夫阶层之间也相当兴盛，这情况给了梁武帝接触多种思想的环境，进而造就了他博通儒道经典，同时也对玄学有所钻研的丰富学识。梁武帝与佛教的接触应当是其在竟陵王萧子良处，与其他“八友”听名僧讲经说法的时候。这一次接触大抵动摇了梁武帝长久以来的信仰，他随即在即位后三年（504）就颁布了〈捨事李老道法诏〉，表明了他作为佛弟子的虔诚与奉佛的决心。然而人的信仰无法轻易改变，从梁武帝颁布此诏后的种种迹象表明，他并未如其诏书中所说真正摒弃儒道二教。从他的言行举止常能见到儒家思想的反映，以至于他常常说的是佛教经典却夹带着儒家思想。由此可见，儒家思想仍根深蒂固地影响着梁武帝的行为与思想，导致他思想上常常混杂了儒佛二教，可以说是极其复杂的。因此，梁武帝的慈悲观之形成不能直接等同于佛教的慈悲思想，也无法简单地一概而论。为厘清梁武帝复杂却又自成一套的慈悲思想，必须从儒家及佛教思想探讨。

据此，欲探讨梁武帝慈悲思想之形成及其自渡渡人的行为模式，大致可归纳为四点：一是儒家对他的影响，二是他所重视的佛教经典，三是他自诩的“皇帝菩萨”概念，四是慈悲思想本身。下文将围绕以上四点，针对其对于梁武帝慈悲思想及自渡渡人行为模式形成的影响进行论述，而后总结阐述梁武帝所形成的慈悲观念及其内容。



## 第一节 儒家的影响

南朝时期，儒家思想作为人伦道德的根本与帝王的统御之术依旧盛行于世，生为齐皇室同族的梁武帝自小便受儒教的洗礼博学六经。恰好其家族世奉老子道教，因此他也拥有接触道家思想的家世渊源。年少的梁武帝“少而笃学，洞达儒玄”（姚思廉，1973：96），对于学问有自己的一番见解。在竟陵王萧子良的西邸聆听名僧讲经后，他对佛教也产生了兴趣并加以研习，甚至自身也投入佛教修行之中，且下诏明其事佛决心。《梁书·武帝下》载武帝：“造《制旨孝经义》，《周易讲疏》……《孔子正言》，《老子讲疏》，凡二百余卷”又载其“笃信正法，尤长释典，制《涅槃》、《大品》、《净名》、《三慧》诸经义记，复数百卷”（姚思廉，1973：96），可见其毕生所学颇多，且对各教加以钻研，博通各教经典之思想内容。

有鉴于此，梁武帝当非只混杂各教思想的人，其不只提出以佛教为主的三教同源说，在行为和政治上也实施三教并用的政策。梁武帝并未彻底摒弃儒教与道教，只是信仰中心变为佛教而已。故其在讲经或解释经典时也会引用儒家经典，如其〈净业赋〉中引用《礼记》的“性”以说明他对于世人皆有佛性的见解。其〈捨事李老道法诏〉言：“止是世间之善，不能革凡成圣”（大正藏 52, p. 0111c），三教都是教人为善，仅“凡”、“圣”有别而已。正如任继愈所说，梁武帝信仰佛教称其为正道与其三教兼用施政并不矛盾（任继愈，1988：16），故梁武帝的思想中即便是儒家与佛教等并存，也无矛盾存在。

儒家思想是扎根于梁武帝心中一股不亚于信仰的力量，它在梁武帝推广佛教时不仅有辅助之作用，同时也提高了他对于佛教的接受度。佛教作为来自印度的外来宗教在华夏土地上始终难以被接受，撇除来自异域这一因素，文化背景之差

异也导致他们的习俗与汉人传统有所冲突。印度佛教所提倡的出家修行在以忠孝为中心思想的儒家眼里，已是一种抛弃父母的不孝之举，加之剃度舍弃俗名等一系列愧对于父母恩的举动，以及出家人不娶不嫁导致家族断后的行为，对儒家思想熏陶下的汉人而言简直是大不孝。总体而言，佛教的修行、习俗与规制等对于汉人沿袭的传统存在明显的矛盾，故无法轻易被汉人所接纳，而这也是佛教初传中国时面临的重大难题。

然而，佛教究竟是教人向善以渡人解脱为宗旨的宗教，其凭借着价值观中与儒家道德思想相通之处使人放下了戒心。举例说明，在《孟子·梁惠王上》中也有类似于佛教的慈爱去杀的内容，其载“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朱熹，2012：208），虽然是以儒家所重的君子阐述了君子的不忍之心，但其中的护生、同情的情绪是相通的。除去两家相通之处提高了汉人对佛教的接受度外，佛教也利用其谦逊的特点，融入大量的儒、玄、道等思想以完善自身，顺利地完成了在中土的传播。譬如，佛教将本不存在于印度佛教中的孝道观念纳入，调和中土传统、儒家习俗与自身的矛盾之处。而梁武帝正是将这样的佛教在南朝大肆推广，并且利用这种“调和”当作自身思想的调和剂，以达到思想与行为上的平衡。

此外，儒家的仁爱利他思想与经世济民也深植梁武帝心中，致使他在理解佛家教义时也以利益优先的角度去思考。儒家思想强调君子重义而不重利，那么“利”的部分从何而谈呢？所谓“利”指的是儒家中男子、君王虽不以功名利禄为目标，但是仍然需要建功立业故而要有的利人利他思想。而梁武帝身为君王自然带着这一种需要建立丰功伟业、造福人民的思想，因此在他体悟到佛教的妙处之后，便抱着要将佛教的益处教于众人的想法。从儒家经典《论语·里仁》之中论述“君

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便可知，君子所重视的是道义而非利益。然而，佛教修行所带来的利益则与儒家中的“利”有所不同，而是对于个人修为以及佛法修行有所助益。因此，梁武帝推行佛教的情况便符合为了道义而将佛法分享给众生，也便没有了重视利益的成分。他推广佛教的行为便成了一种经世济民，自渡渡人的表现。

梁武帝基于家世背景的关系从小就研究各家思想，对佛教的大乘经典也因个人喜好而加以研习，自然也触及般若学中所说的诸法性空以及涅槃学中的思想。他如此刻意且积极频繁地推行佛事究竟目的何在？梁武帝将佛家的修行当作是做功德和累积善行、福田的行为，对他而言，积极推广佛教使更多人入寺出家修行，便是一种大功德。其次，翻译与诠释大乘经典、举办法会等也是弘扬佛法的行为，自然也被梁武帝取法。然而，梁武帝又是为了什么而如此累积自身的功德呢？此则与梁武帝所重视的两部大乘经典——《般若经》与《涅槃经》有关。

## 第二节 佛教的影响

《般若经》与《涅槃经》作为南朝时期大热的两部大乘经典，引起了梁武帝的格外重视。般若学主张“诸法性空”，客观现象及世俗认识都是“假有”，因此唯有通过修行般若智慧观察世间才能不为世俗假象所迷惑。般若学自魏晋以来便因与玄学相似而受士大夫喜欢，然随着对佛教的学习渐深，空乏的理论便已无法满足他们。人们转而追求成佛主体与佛性等的问题于是投入到涅槃学，而“众生皆有佛性”、法身常住等的研习让部分学者在接触之后对般若学产生怀疑。然而梁武帝曾在〈注解大品经序〉表明“涅槃是显其果德，般若是明其因行，显果则以常住佛性为本，明因则以无生中道为宗”（大正藏 55, p.0053b），说明般

般若学和涅槃学其实是出世修行中的两端，两者之间并无优劣之分，反而是一种因果关系。据此，梁武帝对《般若》、《涅槃》两部经典的研习可谓独到。

般若学提倡修行般若智慧以便不受客观假有的世界所迷惑，涅槃学则是以佛性与涅槃解脱为内容。而由于梁武帝对般若学与涅槃学是两者并重的关系，他便积极奉行宗教实践并且利用其帝王身份的便利性大举推行佛教，以期“愿使未来生世童男出家。广弘经教化度含识共同成佛。”（大正藏 52, p.0111c）能够经他手实现。可见得梁武帝的行为是包涵了般若与涅槃二者，经过他自身的思考方得出的结果。梁武帝主张修行方能获得解脱（任继愈，1988：32），然而却不满足于仅自身一人修行，反而是要以一种“皇帝菩萨”的姿态推行佛法修行，自渡的同时也要渡人。在梁武帝所熟悉的大乘佛教中，“菩萨”即是这一种广修佛法、救渡众生的宗教实践者之形象。

菩萨在大乘佛教中可谓是核心的存在，但是菩萨不仅是种类、阶位繁多，甚至连内涵都各有不同。虽然菩萨有多种形象与不同的修行，他们皆共有一种固定的行为模式，即：以成佛为依归救护众生、修习佛法。《南史·梁本纪》中仅记梁武帝于天监十八年（519）受佛戒（李延寿，1975：196），并未阐明他所受的是何种戒持，然从其他人对他的称呼，所受为菩萨戒这一点应是毋庸置疑的。加之，无佛思想<sup>4</sup>在南方的体现即是催生了大乘菩萨思想以及菩萨戒的风行（颜尚文，1999：50），梁武帝会选择“皇帝菩萨”这一身份亦有受此影响的可能性。菩萨相较于北朝的“如来”形象更加亲切，加上救护众生的特性，不免给信徒一种平易近人且易于信任的形象。而这样的形象，也使梁武帝在推行佛教时更易被民众所接受。

---

<sup>4</sup> 佛教信徒因处在南北朝政治紊乱、民不聊生的时代而催生的一种佛教徒自觉，反映出佛教徒因所生时代前不及佛陀在世，后不着弥勒佛再世的“无佛感”。内容详见颜尚文著《梁武帝》一书。

“皇帝菩萨”对梁武帝而言是一个身份地位的象征，政治上掌握实权意味着他能够利用这份力量实行他所期许的政策，而“菩萨”的身份则给予他以渡人为己任合情合理地推动佛教的理由。据颜尚文《梁武帝》书中所说，梁武帝选择“皇帝菩萨”作为称号有着与北朝相对，同时也要稳固自己在僧团中的权力地位的目的。（颜尚文，1999：57）他要通过政治手段来管辖南朝那些有“沙门不敬王者”思想的僧团，以便在僧众势力中拥有稳定的地位与权力。然而，从梁武帝所为及他的后续发展来看，作为政治手段的“皇帝菩萨”称号逐渐超出政治范围，往宗教实行的方向渐行渐近。估计梁武帝越加深入研习佛教，便越发倾心，遂丧失了他的政治野心罢。也正因他对于佛教的倾心，他打着“皇帝菩萨”名号所推行的佛事才更能展现出他个人对于世人与众生的慈悲心，发扬着菩萨慈悲为怀的思想。

佛教的慈悲观从《广弘明集》的〈慈济篇〉中收录的数篇中可知，主要是阐明佛陀所传授的慈爱去杀思想。其内容大多都与护生、不杀以及不食肉有关，故大略可知当时的慈悲思想约是与不杀生、不食肉有所关联。慈悲二字具有“为众生求得安乐，除去痛苦”的意思，《大般涅槃经》云：“为诸众生除无利益，是名大慈；欲与众生无量利乐，是名大悲”（大正藏 12，p.0696a），即是让所有众生都安乐生活的意思。梁武帝个人所受的直接影响是《大般涅槃经》、《小品般若经》等当时盛行于南朝的佛经，故他所知慈悲思想为“令众生安乐”和“不杀”、“素食”等。因此，梁武帝除了造寺建像、举办法会之外，也颁布了如〈断酒肉文〉、〈断杀绝宗庙牺牲诏〉之类强调去杀、不食肉思想的诏文，显然认为慈悲与度化众生、不杀护生是有关联的。

## 小结

综上所述，梁武帝的慈悲思想并非单从佛教的角度就可一概而论的。从他平生的经历以及南朝佛教环境的影响来看，他的行为动机与思想的复杂性可见一斑。

首先，儒家思想对梁武帝造成了影响，致使他以利人利己的眼光去看待佛教；而般若学与涅槃学先后出现并盛行的情况，也启发他两者的因果关系，使他萌生修行般若智慧能够使人证得涅槃的想法；因应佛教徒的无佛感而生的大乘菩萨思想，则是给予他作为“皇帝菩萨”修行佛法、广弘经教并且渡化众生的概念；慈悲思想本身则是他行为之准则，让他有着明确方向修行并且推行佛事。由此种种混合而来的，便是他以自身修行为主要目的受戒持斋修身的同时，以推广佛事、弘扬佛法及救渡更多众生为辅助己身修行的行为模式。故此，他所颁布与佛教相关的诏令、所行佛事以及举办的法会，都是他自渡渡人模式的一环。

简而言之，从梁武帝的行为模式与动机来说，他所行的佛事大抵不离此二事：累积自身福德及以涅槃解脱（成圣）为最终目的。

### 第三章 梁武帝慈悲思想之体现

本章将从两方面探究梁武帝一生中所行的佛事：其一，从他的诏令、文章中分析其文字与撰写动机；其二，从其所作所为中剖析其行为动机。

#### 第一节 〈断酒肉文〉的慈悲思想

梁武帝所著的〈断酒肉文〉是颇为著名的文章，张桂丹、欧阳镇等学者多从政治视角认为这一篇文章是他为了建立僧团形象而作。南朝时期寺庙林立，百姓多为了逃避劳役赋税而入寺出家，一度出现僧团荒乱难以管理的情况。佛教作为异域宗教本就被视为外教，再加上僧团无纪律的情况更成为了士大夫阶层诟病的理由。梁武帝为了重整僧团纪律与形象，首先任命法超作为僧正撰写《出要律仪》以正寺风，而〈断酒肉文〉则是他用以匡扶佛教的第二步。而他之所以行这一步，便是为了实现他自身的慈悲观，树立一个慈悲关怀众生的“皇帝菩萨”的形象。这一点从他欲自立为“白衣僧正”便可窥见，他既想要一个名正言顺管理僧团的名义，也急欲成为僧团的一份子以做出更多的贡献，兼以利己身。

〈断酒肉文〉内容主张僧人应该戒断酒肉，论述僧人食肉饮酒的九不及外道和九不及居家人。据此，可见梁武帝对于僧人不应食肉的坚决态度，认为作为佛弟子就应顾及自身修为戒断酒肉。梁武帝深谙人性，知道若只是推行吃素持斋必然会有人不实行，于是便以下诏要僧人发誓的方式，加之下令严禁僧人饮酒食肉去限制僧众。如此一来，僧人便没有了不实行的理由，更无法在公开的场合下买酒买肉，更甯提当众饮酒食肉。梁武帝这一决断实则是危险的一步，倘若当时多数僧人都不赞同他，必然会引起僧团的抗拒与反弹。于是此时梁武帝的“皇帝菩萨”身份便成了他的绝佳理由，“弟子无言乃复甚易。但欲成人之美使佛种相续

与诸僧尼共弘法教”（大正藏 52，p.0299a），美其名曰与僧尼共同弘扬佛法教义，实际上是以“皇帝”身份决断勒令禁食酒肉。

从梁武帝推广佛教教义的角度而言，〈断酒肉文〉算是梁武帝普及慈爱去杀思想的第二步。他的第一步是于天监十六年（517）时，三次下诏令宗庙去杀，祭祀不得使用牲畜而以面食果蔬等代替；太医用药时不能加虫畜；服饰上编织缝纫的花纹不能够使用鸟类、兽类或者仙人等图案。梁武帝利用皇帝身份下令宗庙亦不得不从，然而要介入僧团促使僧尼食蔬的话，帝王身份却对有着“沙门不敬王者”思想的他们不管用。于是梁武帝于天监十八年（519）在无碍殿受菩萨戒，显然这是他在思索之后认为最为有效的介入僧团进行改革的方法。“皇帝菩萨”身份既给了他插足僧团的理由，也给了他合理促使僧团素食的身份。而后在普通四年（523）<sup>5</sup>颁布的〈断酒肉文〉便是梁武帝在拥有了适当身份之后，进一步在僧团中“强硬植入”慈爱去杀思想并限制僧尼饮食的手段。

梁武帝在〈断酒肉文〉中援引《大般涅槃经》反复论述“食肉者断大慈种”，请法云法师讲述此经中的〈四相品〉，明述僧人若不断酒肉便会成修行的障碍，甚至是种下恶因。文中载：“经言。食肉者断大慈种。何谓断大慈种。凡大慈者皆令一切众生同得安乐。若食肉者一切众生皆为怨怼同不安乐”（大正藏 52，p.0295c），说明梁武帝认为常怀慈悲心之人应当断食酒肉，以便使其他生物都同样获得安乐。僧尼作为佛弟子即被认为是怀有慈悲心之人，故应该不食酒肉以树立并且贯彻慈悲之心。再者，从《大般涅槃经》中所言食肉不仅会阻碍修行还会种下恶果来说，梁武帝亦有可能是为了“成人之美”让众僧尼生起慈悲心，以利他们的修行并且建立自己的功德和修为。作为推进者的梁武帝其目的性并不明

<sup>5</sup> 关于〈断酒肉文〉的颁布年份史学界仍无一统一说法，众说纷纭的情况下夏德美与陈志远的说法与分析较有说服力。此处采用夏德美分析得出的结果，因其分析根据文献更具说服力。详见夏德美〈论梁武帝的〈断酒肉文〉与佛教中国化〉，《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页87-88。陈志远〈梁武帝与恩团素食改革——解读〈断酒肉文〉〉，《中华文史论丛》，2013年第3期，页94-95。



确，因宗庙戒杀及僧尼茹素并没有直接给他带来益处。故可推断，梁武帝把推进佛事、去杀、帮助他人修行等视为他“皇帝菩萨”的修行方式，这一系列奉佛行为都被当作是为了证得涅槃的功德累积。

其次，〈断酒肉文〉虽是针对僧人而作，但实际受惠者更应是因此而不被食用的家禽牲畜。此处即显示出梁武帝不仅是照顾众僧尼的修为，更是触及此世间的生物。他在〈断酒肉文〉中云：

众生所以不可杀生。凡一众生具八万户虫。经亦说有八十亿万户虫。若断一众生命。即是断八万户虫命。自死众生又不可食者。前附虫虽已灭谢。后所附虫其数复众。若煮若炙此断附虫。皆无复命。利舌端少味。害无量众生。其中小者非肉眼能观。其中大者炳然共见。灭慈悲心增长恶毒。其实非沙门释子所可应行。（大正藏 52，p.0303a）

可见他所顾及的不仅仅是动物，甚至连虫类所受到的影响都在他的考虑范围内。梁武帝基于慈悲而考虑得相当广泛且深入，促成僧尼戒杀不食肉的影响比想象中来得深远。

梁武帝在〈断酒肉文〉也曾提及食肉对于父母兄弟的影响，他说“若使噉食众生父。众生亦报噉食其父。若噉食众生母。众生亦报噉食其母。若噉食众生子。众生亦报噉食子。如是怨怼报相噉食。历劫长夜无有穷已”（大正藏 52，p.0297a），以因果相报的方式言明若吃众生父母子女之肉，众生便会吃自己父母子女之肉，而这样的关系只会生起怨怼，不停地循环。由此可见，梁武帝在思考杀生与食肉时并不只是单纯地将动物当成是一条生命，而是平等地考虑生物亦有父母子女这一事实。他甚至认为食肉会形成一种恶因，且会报应在己身导致亲人遭到“噉食”的恶果。他还说：

经历六道备诸果报。一切亲缘遍一切处。直以经生历死神明隔障。是诸眷属不复相识。今日众生或经是父母。或经是师长。或经是兄弟。或经是姊妹。或经是儿孙。或经是朋友。而今日无有道眼。不能分别。还相噉食不自觉知。噉食之时。此物有灵。即生忿恨还成怨对。向者至亲还成至怨。如是之事岂可不思。暂争舌端一时少味。永与宿亲长为怨对。可为痛心难以言说。（大正藏 52, p.0297a）

此表达他更忧虑的是今所食用的生物或许是至亲转世，而食用后所生的怨怼会使至亲成为“至怨”这样悲伤的结果。此亦可说明梁武帝对食用有生命之物的顾虑，孝顺如他对于父母遭他人或自己“食用”想必相当反感，故他所推行的慈悲去杀也有这一层顾虑。由此，梁武帝相信佛教“因果”的特点亦有所展现。

从〈断酒肉文〉的功能性而言，制止僧尼戒断酒肉减少生杀，同时树立起僧团的良好形象便是其积极意义。此诏所说应断食酒肉的理由中，有部分也适用于劝诫人民百姓不食酒肉。尤其是谈及因果导致父母儿女遭噉食的部分，在拥有强烈孝道观念的中土汉人中极易引起共鸣，是使百姓去杀绝肉的绝好理由。梁武帝这一篇诏文成功地改变了僧团的饮食习惯，并且也树立了他作为“皇帝菩萨”的慈悲为怀形象。他个人也在此文中立誓戒断酒肉表明他的决心，并以自身作为“居家人”的身份去暗示僧尼作为“出家人”更应以身作则。透过此文，不难看出梁武帝的慈悲思想涵盖广泛，而且还具有相当的觉悟及积极性。

综上所述，梁武帝的慈悲思想在〈断酒肉文〉当中的表现为思及众生生命以及愿与僧团共同修持慈悲心的决心。他作为僧团的一份子提出僧尼应当茹素的种种理由，并以帝王身份勒令众僧尼返寺后断食酒肉，将自己视为“菩萨”渡化僧众的荤腥习惯，并且达到了救护众生生命的目的。他着实没有从中获得任何助益，

反而有遭到僧团反弹的可能性，然而他依然决意如此，可见得他应当认为此事有相较于这一最坏结果来说更有利于他的理由。由此，他所能从中获得的应该是他作为佛教护法菩萨，渡化众僧尼并且救护众生的巨大功德。

## 第二节 〈慈悲道场忏法〉、水陆大斋的慈悲思想

〈慈悲道场忏法〉又名〈梁皇忏〉或〈梁皇宝忏〉（以下统称〈梁皇忏〉）为一篇幅宏大的忏文，整整十卷皆为忏悔祈福之用所制。虽然名为〈梁皇忏〉，但学者对于此忏是否为梁武帝所写仍持保留的态度。史学界的意见大致分为不确定、确定以及否定三种，其中印顺法师推断此忏为梁代时僧人根据〈净行法门〉所改而后元代僧人重新校订而成的，认为梁武帝作之说为后人假托；而与其相对立的则有圣凯法师以及徐立强两位，圣凯法师从忏名、文献及石塔造像等角度分析得出〈梁皇忏〉反映了梁武帝奉佛特色的结果，而徐立强则从文献及忏文内容分析认为此忏与梁武帝奉佛特色一致，极有可能是他推动〈断酒肉文〉时附带推行的〈忏悔食肉法〉。以上两种说法皆有其可取之处，然根据〈梁皇忏〉本身之内容分析，此忏与梁武帝思想及奉佛特色的相似之处确实极多。故此，基本可以断定〈梁皇忏〉的制作与梁武帝脱不了干系，应当能够反映出梁武帝的慈悲思想。

〈梁皇忏〉开篇为叙述梁武帝遇见化身为蟒的郗氏现身宫内，祈求他为自己建立功德以除自身痛苦事件的〈慈悲道场忏法传〉<sup>6</sup>。内容显示梁武帝是因此事而召集僧人，询问他们何种善行能够救赎郗氏所受之苦，当得到了为其忏悔这个解答后遂展开了〈梁皇忏〉的撰写与制作。此传所记之内容不受学者所认同，但从中却能得见梁武帝自身的慈悲思想。如此段内容所记，梁武帝认为只要为其“祈一功德”便能“以见拯拔”，证实他抱着业障、恶行可以通过行善、建立功德就

---

<sup>6</sup> 〈慈悲道场忏法传〉原文取自大正藏第45册，〈慈悲道场忏法〉，页0922b-0922c，2020年4月3日。同段内原文将不再重复注释。

可以抵消、救赎的观念。这也证实梁武帝着实认为佛事具有消除罪业、立功建德的功能，故此传后续才会记述郗氏因梁武帝举办的忏礼而“得生忉利天”。由此可见，梁武帝对于诸如忏法等佛事抱着一种为己所用的功利性思想，将其视作一种帮助自己修行建立善行功德的手段。这也成为了梁武帝实行慈悲思想的主要动机，因慈悲心的焦点在于修持佛法之同时页一并救护众生，而这与梁武帝的目的也正好吻合。

通读〈梁皇忏〉后可知，此忏文是一部针对人所犯的各种恶行、罪业等所制作的忏悔之文。除了为现身于道场一同悔过的大众忏悔、祈福之外，〈梁皇忏〉中也出现了这样的字句：“以此功德力。令诸众生各得所愿……令诸众生尽得解脱究竟成就无上菩提”（大正藏 45， p.0924b）、“令六道一切众生。以今忏法。一切众苦皆悉断除”（大正藏 45， p.0926a），表明除了为在场人士忏悔祈福外，也包括为四生（胎生、卵生、湿生、化生）及六道（天道、阿修罗道、人道、畜生道、饿鬼道、地狱道）的一切众生忏悔祈福。可见得此忏法所欲涵盖的众生之多，遍及人与非人的一切生物，这一点与梁武帝细致入微的慈悲形象相符合，也与他为郗氏立功德的记事相符。由此，可见得梁武帝想借由此忏文达成的主要目的应是同时针对在世与已辞世的“人”和一切有情众生，忏悔并且祈愿以同得道解脱。

忏文中亦时有“诸佛圣人所以得出生死度于彼岸者。良由积善之功故。得无碍自在解脱”（大正藏 45， p.0925a）等诸如此类的句子，表明梁武帝认为诚心奉佛累积善行功德对于解脱的重要性。这一点也与他在〈断酒肉文〉中说食众生父母肉亦会招致父母肉遭众生食的部分相似，〈梁皇忏〉中记述：

……大众当知。善恶二轮未曾暂辍。果报连环初无休息。贫富贵贱随行所生。非有无因而妄招果。所以经言。为人豪贵国王长者。从礼事三宝中来。为人大富。从布施中来。为人长寿。从持戒中来。为人端正。从忍辱中来。为人勤修无有懈怠。从精进中来。为人才明远达。从智慧中来。为人音声清澈。从歌咏三宝中来。为人洁净无有疾病。从慈心中来。为人长大恭敬人故。（大正藏 45，p.0932a）

此论述人之所为会招致不同的果报，而诚信奉佛的人会得善果、善报，来世生得较好。由此可见，梁武帝对于奉佛行为能够帮助修行得道是认同的，并且可以说是有“利益”上的考量。

此外，在〈梁皇忏〉卷三的“显果报第一”<sup>7</sup>里讲述了多受苦的众生，都是因为前世犯下罪业所招致的。其中不乏不孝父母、不信三尊、杀害众生、偷盗、饮酒、烹煮众生等恶业，而在这之中数量最多的则以残害、烹煮众生为多，其次则是对佛教、僧人或三尊等不信或迫害以及不孝父母，最后才是饮酒、偷盗等。梁武帝曾在〈断酒肉文〉中论述众生身上都带着八万户虫，故若残害、猎杀或者烹煮一众生，则相当于是间接杀害了八万户虫，其罪孽之深当是重中之重。因而，可见〈梁皇忏〉中讲述“护生”的篇幅之多应是梁武帝的慈悲思想所致。其次，他对于推广佛教的坚持也显见于此忏文中，僧人犯下有关僧人、佛教等的恶果在“显果报之余”<sup>8</sup>中也有所提及，其内容是以僧人中的不同身份犯下不同罪业，而招致不同果报为主。可见其作此忏不仅是要忏悔伤害众生、饮酒食肉等，也包括了为百姓对于佛教、僧众中等的不敬而悔过。

<sup>7</sup> 〈显果报第一〉内容参见大正藏第 45 册，〈慈悲道场忏法〉，页 0932a-0937b，2020 年 4 月 3 日。  
[https://tripitaka.cbeta.org/T45n1909\\_003](https://tripitaka.cbeta.org/T45n1909_003)。

<sup>8</sup> 〈显果报之余〉内容参见大正藏第 45 册，〈慈悲道场忏法〉，页 0937b-0939a，2020 年 4 月 3 日。  
[https://tripitaka.cbeta.org/T45n1909\\_004](https://tripitaka.cbeta.org/T45n1909_004)。

从〈梁皇忏〉作为忏文的功能性而言，它的作用为忏悔以及祈福，对象则是不拘泥于现场者而旁及六道有情众生等众多群体。从其规模及内容来说，此忏文作为梁武帝为了自身累积功德的工具是最合适的。〈梁皇忏〉既能够为梁武帝自身忏悔祈福，亦能够为广大众生悔过罪业累积福德，梁武帝也因此得以树立一个造福了众生的“皇帝菩萨”形象。再者，〈梁皇忏〉内容亦能够成为劝诫众生的劝导文，因其多有论述诸恶业所产生的恶报，其中不乏涉及前世今生、地狱饿鬼等具有威吓力的内容。透过此忏，亦能够收获弘扬佛法的效果，并且增加信众。此外，透过此忏回向予众生以及已逝者的功德亦能为梁武帝所得，因此而获得救渡的众生即是梁武帝的功德。

除了〈梁皇忏〉之外，梁武帝也举办了水陆大斋以救济众生，对象也同是针对“六道四生”（释志磐，1992：1342-1343）。据宋代释志磐在《佛祖统纪》所记水陆大斋是有一部仪文的，此仪文的制作渊源是梁武帝梦见神僧告诉他众生受苦，建议他作水陆大斋救济众生。此仪文与〈梁皇忏〉同时为生者及死者忏悔祈福有所不同，水陆大斋是以设斋供奉的方式超渡水陆一切鬼众的法会。就性质上而言，两者都是为了超渡而举办，其差异仅是在于对象以及方式的不同而已。从这一点观之梁武帝的慈悲思想不仅是照顾到生者，对于已逝者的超渡也关注。也因为这一类的斋会并不会给梁武帝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利益，他做这些的唯一可能性即是基于他自身对于佛教以及修行的考量。据此可以推断梁武帝对于佛教是真心侍奉，而他所行的佛事则都是以他自身的慈悲思想为基础。

### 第三节 奉佛事迹反映的慈悲思想

梁武帝自下诏宣布舍道事佛后，便开始在境内大推各种各样的佛事，企图以这样的方式弘扬佛教，推广我佛慈悲的思想。他自持着“佛法寄嘱人王，是以弟子不得无言”（大正藏 52，p.0294b）的想法，一心将推广佛教与佛事等视为己任。加之，梁武帝的慈悲思想里并不只是佛教的慈悲观而已，还杂有利己的思想，因此他的行为动机除了推广佛教之外还带有为自己建立功德的部分。综合以上两点，梁武帝的事佛行动就有更为明确的动机与方向性，且不提〈断酒肉文〉、〈梁皇忏〉以及水陆法会，他的奉佛行为早就为众人所知。

首先，梁武帝最著名的奉佛事迹当属舍身入寺最广为人知。唐姚思廉的《梁书》载梁武帝三度舍身入寺，群臣次次都集大量财宝将他从寺中赎回。从一国之君的角度来说，他这样的举措实是儿戏，一来一回还劳群臣大费周章将他“赎”回宫中，不免有些不明所以。后世分析梁武帝是为了使资金流入寺庙，并借此鉴定朝臣对他的忠诚才会出此策。然而这说法似乎不太合理，若朝臣不集资将他赎回，若朝臣立时拥立太子即位，他就失去了帝位。故此，合理推测应是梁武帝为了进一步修佛而入寺，群臣会用财报将他赎回宫中应也只是出于情面的权宜之计。他真正的目的应该是入寺修行，而庞大资金流入寺庙则是在思及政事需要后，让梁武帝认为以此交换的话就能够妥协于众臣回宫的妥协条件而已。

其次，梁武帝在位期间多次举办法会、讲经等活动，据学者统计他所举办的万人法会在他在位的四十八年间就有十六次之多（赵鹏，2013：123），这数据甚至还未纳入其他千人、百人的法会以及讲经活动。从功能性而言，法会和讲经都只是用以超渡、忏悔以及推广佛教教义的管道，并不具备带来实质性利益的特性。因此若佛教只是梁武帝的一种政治手段，次数未免太多。较合理的论断当是

梁武帝举办弘扬佛法的法会与讲经大会，以此作为吸纳信徒的手段故其在位期间多次举办。他将此当作一种“广渡他人”的方法加以实行，妄图借此累积自己的修行与福德。由此，也能判断梁武帝对于佛教是绝对虔诚的。

除此之外，梁武帝所作以及命人编撰、翻译的佛教典籍不在少数，虽如今大多已亡佚，但也有得以留存于世。由此，也能够证实梁武帝对于佛教义学的重视和喜好。其中，记载了其佛教思想的现存的著作包括他的〈立神明成佛义记〉、〈为亮法师制涅槃经疏序〉以及〈净业赋〉等。而影响后世最多的要属〈断酒肉文〉、〈梁皇忏〉以及水陆法会，以上这三者。通读梁武帝的著作不难发现他对于佛学有着自己的一套思想，对于经典中未言明的部分也有自己的思考和结论。可说是对佛教相关的事物有所钻研，并且拥有自己的思维模式和思想。这不仅仅是体现在他的著作中，也借由他的行为而落实。

再者，南朝境内的寺庙以及佛像数量众多，这也是梁武帝即位后推广佛教所为。南朝时期，建立寺庙和铸造佛像成了当时的王公贵族以及门阀士族等的一种潮流。寺庙林立的情况甚至让唐代诗人杜牧忍不住写下“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诗句，可见当时的景观之壮丽仿佛东方的佛教大国。根据任继愈先生所提出的两个资料显示，梁时的寺庙总数达到两千八百四十六所，而梁武帝命人建设的就多达九十二所，数量明显比诗人所描述的四百八十更多。寺庙与佛像的铸造说明梁武帝对于佛教的倾心，并且也显示他对佛教的贡献。因建立寺庙所需要花费的财力与人力不少，这也显示他对于佛教的重视程度。

综合上述种种，梁武帝奉佛是他一心所愿，并不仅仅是他的政治手段。他的著作以及行为举止都透露着佛教是他的依归，而他也借着佛教修为去修习自己的身心、累积自己的福德以忏悔过去种种。作此判断的主要理由是梁武帝的奉佛事



迹中包含多种并不会带来实质性回馈的行为，而他的著作又多处显露出他认为忏悔祈福能够累积福德，使人得以得道成佛。另外，从他认为累积福德就能得道的想法，可以判断他的目的应是以佛教作为修行的手段，使自己能够证得涅槃果德。

## 第四章 结语

梁武帝的慈悲思想所导致的奉佛行为当中，有者是对当代以及后世影响深远的，但也有者是并无太大反响的。除去影响力本身，更重要的应该是他所造成的影响究竟孰好孰坏。探究梁武帝所作的种种，不难发现其实两者是好坏参杂的。

首先，梁武帝所奉行的众多佛事之中，影响力最深远的当属其所颁布的〈断酒肉文〉。〈断酒肉文〉不仅仅是对梁朝时期的僧尼有所影响，在梁朝亡国之后也作为汉地佛教的戒律被广泛流传，以至于汉传佛教有了别于原生印度佛教的风貌，时至今日汉传佛教仍旧维持着不食酒肉的习惯，可见其影响之深远。由此，亦可以说梁武帝在当时所推行的戒杀素食不饮酒相当成功，毕竟也成为了今日汉地佛教的特点之一。其次，〈梁皇忏〉以及水陆大斋在梁时以及其后的朝代也一度盛行于民间。甚至从梁武帝起，忏法的用处从原本的僧人忏悔所犯戒律转变成世人用以忏悔过去和祈福，忏仪本身变成了僧侣以及寺庙用以赚取经费的途径之一。除此之外，梁武帝的所作所为大大地推动了佛教在中土的传播。在他的推动下，佛教与儒道二教间的相通之处更明显可见，更促进了佛教的中国化。这不仅是增加了汉人对于佛教的接受，也替佛教吸引了大批的信徒。

梁武帝的宗教实践目的虽是以利人利己的模式运行，他却依然没能顾及南朝境内大量的百姓。从梁武帝所提出的〈断酒肉文〉、〈梁皇忏〉可以看出他的出发点是救济众生，然而当他提出要修寺建造佛像甚至是舍身入寺时，都没有考虑过这些决定为百姓带来的负面影响。梁武帝命人建造寺庙和佛像，征用百姓也就是给他们增加劳役；他舍身入寺后众臣以财报将其赎回，用的也是从国库中由人民付税而来的钱财；他举办的种种法会与讲经活动常常都动辄数天，还提供膳食，这也是一大笔庞大的开支。而这所有的开销全都要由辛苦的百姓来买单，成为他

们生活中的另一重重担。百姓不仅是苦于劳役和赋税，甚至还要忍受他对贵族剥削的放任，生活上非常艰苦。由此种种，可见梁武帝在奉佛实践其慈悲思想时，并未深入体察民情，只是一味地为了自身与周遭的利益而动。

综上所述，梁武帝所怀揣的慈悲观实则是一种功利主义的利己利他式修行。他以累积功德为主要目的，实践自身的修行同时亦将推广佛教、济世渡人视为己任，积极地劝导世人遁入空门。然而他建寺造像、舍身入寺、举办法会等推广佛教的举措，却是需要大量的人力与财力支援方能实践的。他一心弘法，却不曾想所作所为恰恰相反地造成民生困苦，人民生活水深火热。人民苦于担当他修建佛寺制造佛像的人力资源，又要因为他舍身入寺和举办法会等所需的资金而受到经济上的剥削，生活自是苦不堪言。梁武帝却没有注意到他的做法不当，也不思考国库空虚、人力匮乏对国家的影响。由此可见，学者会称其佞佛似乎也不无道理。然而，若说梁朝是因为梁武帝的佛教实践而亡国则未免太过牵强。百姓为逃避劳役赋税而入寺，虽然减少了重要人力并且有导致收成减少的可能性，但也绝不是仅凭这点就能左右梁朝是否亡国。梁武帝虽然热衷佛教，但决不能说是因为佞佛而导致了亡国。梁朝的朝中情况、社会风气、局势与战况等必然也有所影响。

综上所述，梁武帝所行的慈悲思想并未周全地顾及众生，反而侧重于他自身的修行和福德建立，应说是一种自私自利的慈悲思想。在他狂热的佛教实践下，佛教的中国化被大幅推进，在中土被汉人接受的程度也增加不少，而他的推动的僧人戒断酒肉更是作为汉地佛教的特色传承至今。虽说他因更重视自身修行而盲目地奉佛，没有顾及百姓的生活，导致他们为了规避劳动和税务而入寺，但他依然以他的方式积极地处理寺内芜乱的情况。梁武帝的慈悲思想过于狭隘，以至于

只看得见自己以及身边的人，没有办法如佛教所说的顾及一切众生。即便如此，他对于佛教的弘扬仍旧功不可没，以一凡人角度来说，其所为可说是已尽己所能。

## 参考文献

### 一、书目

1. 方立天（1982），《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北京：中华书局。
2. 【唐】李延寿（1975），《南史》（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
3. 任继愈（1988），《中国佛教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4. 【宋】释志磐（1992），《佛祖统纪》，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5. 汤用彤（1983），《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中华书局。
6. 颜尚文（1999），《梁武帝》，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7. 【唐】姚思廉（1973），《梁书》（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
8. 【宋】朱熹撰（2012），《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

### 二、期刊论文

1. 陈伟娜（2008），〈梁武帝萧衍的佛学思想及宗教实行〉，《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7卷第4期，页52-54。
2. 陈志远（2013），〈梁武帝与僧团素食改革——解读〈断酒肉文〉〉，《中华文史论丛》，2013年第3期，页94-95。

3. 华方田（1988），〈关于梁武帝奉佛事迹的两个问题〉，《五台山研究》，1988年第2期，页18-20。
4. 欧阳镇（1996），〈试述梁武帝力促佛教僧制的中国化〉，《江西社会科学》，1996年11期，页63-65。
5. 夏德美（2010），〈论梁武帝的《断酒肉文》与佛教中国化〉，《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页87-92。
6. 徐立强（1998），〈“梁皇忏”初探〉，《中华佛学研究》，1998年第2期，页177-206。
7. 张桂丹（2007），〈论梁武帝崇佛之原因〉，《江南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第28卷第2期，页101-104。
8. 赵鹏（2013），〈梁武帝佛缘探究〉，《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5卷第1期，页122-124。

### 三、学位论文

1. 陈佳政（2011），〈忏法、慈悲与佛教中国化——以《梁皇忏》为中心〉，杭州：浙江大学。
2. 杨永佳（2013），〈梁武帝对中国佛教的影响研究〉，重庆：西南大学。

#### 四、电子资料库

1.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12 册，《大般涅槃经》，页 0696a，1988 年。  
[https://tripitaka.cbeta.org/T12n0375\\_014](https://tripitaka.cbeta.org/T12n0375_014)。
2.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52 册，《广弘明集》，〈捨事李老道法诏〉，页 0111c，  
1988 年。[https://tripitaka.cbeta.org/T52n2103\\_004](https://tripitaka.cbeta.org/T52n2103_004)。
3.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52 册，《广弘明集》，〈断酒肉文〉，页 0294b-0202b，  
1988 年。[https://tripitaka.cbeta.org/T52n2103\\_026](https://tripitaka.cbeta.org/T52n2103_026)。
4.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45 册，〈慈悲道场忏法〉，页 0922b-0967c，1988 年。  
[https://tripitaka.cbeta.org/T45n1909\\_001](https://tripitaka.cbeta.org/T45n1909_001)。
5.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55 册，《出三藏记集》，〈注解大品经序〉，页 0053b，  
1988 年。[http://tripitaka.cbeta.org/T55n2145\\_008](http://tripitaka.cbeta.org/T55n2145_008)。

